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
WENYIXUEYUMEIXUECONGSHU

审美

SHENMEI ZHISI

之思

张晶◎著

——理的审美化存在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审美

SHENMEI ZHISI

之思

张 晶◎著

——理的审美化存在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张晶著，—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12

ISBN 7-81004-994-1

I. 审… II. 张… III. 文学理论-审美评价-中国-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912 号

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

著 者 张 晶

责任编辑 陈友军

封面设计 武晓强

版式设计 阳金洲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 编 100024

电 话 65738557 或 65738538 传 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bbi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装 北京市金华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

版 次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004-994-1/G·62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新的世纪呼唤着新的学术，我们肩负着一份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

这套文艺学与美学丛书，是我们献给新世纪的一份礼物！

文艺学与美学，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华，历经了许多世代的升沉沧桑，结下了无数睿智的硕果。20世纪是文艺学与美学多元互补的时代，也是较之以往世纪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新的思想的时代。而在中国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文艺学与美学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迁，却是令世界学人瞩目的。

我们没有理由辜负这个时代。探索与发展是我们锲而不舍的追求！

广播学院的文艺学与美学学科，也许还并不强大，也许还远没有“振臂一呼”的资格，但却聚集了一批学有所长、勇于探索的学者。他们在耕耘，他们在掘进，他们在用生命的激情和理性的智慧来孕育强大的明天。天时，地利，人和，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最佳契机。

为了支持文艺学与美学的学科建设，学院领导倾注了大量心血，这套丛书就是在刘继南

院长和其他院领导的亲自过问与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的作者与主编，都是北京广播学院从事文艺学、美学及相关领域的教师。而这套丛书中的《美学前沿》一书，是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汇集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专家学者的文章，在这里，编委会特向这些热情支持丛书的专家学者深致谢意！

受丛书编委会的委托，丛书主编蒲震元教授、杜寒风副教授为丛书的组织、编辑工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丛书共有八部，不求一律，但求一家之言。丛书酝酿组织时间不过一年有余，而各部书稿则皆为作者积年研究所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期待着来自于广大读者的中肯针砭与诚恳批评。如此，将是丛书之幸，作者之幸。

我们以这样一束素朴的小花，献给祖国的学术事业！

《文艺学与美学》编委会
2001年7月

内容提要

《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收入了作者近年来对于美学问题的一些新的思考，还有从哲学与美学、哲学与诗学关系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关于美学问题，作者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提炼熔铸了若干新的审美范畴，如“偶然”、“体物”、“审美惊奇”、“审美回忆”等。有些虽然是人们有所关注、有所研究的，如“审美感兴”、“透彻之悟”等，但本书作者则是在全面占有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对其从新的角度进行独特的开掘。这些文章多是从哲学的高度对特定的审美范畴进行观照，从内涵与外延上都有了与以往研究相比较大幅度的突破。《审美惊奇论》、《审美回忆论》是从大量资料中提炼出的兼容中西美学的新的范畴。《远：超然之美》、《墨戏论》、《逸的升腾》是关于绘画美学的新探索。《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则是对艺术中的哲理提出了不同于旧说的全新观点。《入兴贵闲》，是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的一个命题作为切入点，综合大量理论资料，进行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整合。

本书的另一部分内容，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考察古典美学与诗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这部分研究集中于玄学、佛学与理学乃至心学与诗学或画论的相互融通关系。《陶诗与魏晋玄学》以陶诗为切入点，对玄学思维影响下的魏晋审美特征作了独特的探赜。《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一文，把宗炳作为著名画论家和作为佛教思想家联系起来，把他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应会感神”等美学命题与其佛学思想联系起来认识。《禅与唐宋诗人心态》、《禅与个性化创造诗论》、《宋诗的活法与禅宗的思维方式》、《诗与公案的因缘》等专题，都从唐宋时期佛学主流的禅学思维方式与受其影响甚深的诗学的关系进行探讨。《元代正统文学思想与理学的因缘》、《朱熹诗境与“理一分殊”》则重点研究了朱学中最核心的哲学命题“理一分殊”与其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刘因的理学与诗学》是研究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的刘因的理学思想与其诗学主张及创作之间的内在联系。《陈献章：诗与哲学的融通》，则是对明代著名的心学家陈献章的心学思想与其诗学思想的关系进行深入探索。

本书所体现的特点主要在于从哲学角度来观照美学范畴与诗学观念或创作倾向，而这里的哲学，不是一般的哲学原理，而是中国哲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内容（也有一些西方哲学的内容），如玄学、佛学、理学等，带有历史性的眼光来具体分析其间的联系，同时又看到其间的差异。既认识到美学思想与哲学的密切关联，同时，又看到某种哲学范畴进入美学领域中所发生的变异。

序

顾易生

张晶的新著《审美之思》即将问世，嘱我为序。我和张晶同志有一段很好的师生情缘，似乎没有推却的理由，于是便欣然命笔了。

张晶从事文艺学、美学研究有年，发表过不少的成果。我记得在他读博士生的三年时间里，就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学术月刊》、《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等名气很大的刊物上，在复旦大学这几届的博士生里，是成果突出的。他的研究很有自己的特色，不属于那种纯粹的概念性的研究，而是从一些文学现象或理论遗产中提炼出来的理论问题。张晶在硕士阶段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很长一段时间是搞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后来因学科建设的需要，又转到文艺学专业从事古典文论与美学的研究。这样一个学术经历，使他的著作和文章既有坚实的文学史基础，又有较为透辟的理论眼光。高屋建瓴、不拘泥于琐屑的具体文学现象而又有着历史主义的厚重感，这也许是张晶的学术特色吧！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的创造性与坚实的学问功底是同样重要的。叶燮讲“才、识、胆、力”，并说“此四言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原诗·内篇》），我以为一个有所成就的学者也须以此为其基本素质。思想上的创造性，就是要有胆有识，善于发现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前人、别人都未曾提出的理念，这就要有胆有识。真正在思想史上有地位的人，哪一个不是提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理念的呢！但这不可以是凭空臆造，而是在综合大量的具体研究基础之上，才可以为人所信服。张晶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理念，大都为其所独创，发前人之所未发，很有思想锐气；但又不显得浮躁空疏，而是在大量的文献基础上自己熔炼出来的，透着一种学术上的成熟性。一阅之下，倍感欣慰。

对于我们这些治传统学术的人来说，做学问的艰辛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学术上的成就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是不靠“大哄大嗡”，而是靠扎扎实实的苦工夫得来的。光下苦工夫还不够，还要有自己独到的理论眼光，有自己的综合能力。想在学术上搞“投机生意”，必然被学术界所不齿。张晶在复旦读书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有“慧根”，又肯下工夫。他读博士之前已经是教授了，在学术圈子里已广为人知，但仍然非常认真以按我的布置来啃书本，很勤勉地写作业，每次交上来的作业，都是很有自己观点的文章。他的学有所成，当然不是一日之功。

希望张晶能以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为中国的学术事业增添一点光彩。

是为序。

于上海国顺路寓所

2001年7月24日

在美学、哲学与诗学之间

（代自序）

如果要在本书中找出一点属于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透视美学与诗学。这也是我多年来在学术研究上的思维习惯。

我当然并不认为这就是从事文艺学、美学、诗学研究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多元化的，每位学者都有自己擅长使用的方法，一位学者也可能因了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方法，在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是学术研究正常而健康发展的标志之一。我只是自己多年来形成了从哲学的层面来探索美学与诗学的奥秘的癖好而已。

我从本科就是文学专业的学生，硕士读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博士读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本没有什么资格侈谈哲学。但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开始步入文学研究的殿堂，就在导师的熏陶下开始了对哲学的心仪与濡染。当时对我的哲学兴趣影响至深的是张松如教授，也就是著名的诗人公木。公木师不仅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深远影响的诗人，不仅是一位创作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英雄儿女》的歌词作家，他更是一位有着高尚人格与思想家气质

的著名学者。公木师不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是国内的权威专家，而且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也有精深的造诣。他的《老子校读》一书，在中哲史研究领域是有广泛影响和重要地位的。著名哲学家陈鼓应先生的名著《老子注译及评介》，便以公木师的《老子校读》为主要参考文献。公木师又在哲学上创为“第三自然界”之说，把艺术王国定义为“第三自然界”，在哲学界引起了深刻的反响。读本科时，选修公木师的《中国诗歌史》课，就对公木师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仰慕不已。时光已经流逝了二十余年，公木师讲课时那对学生的热诚态度，激动时不时甩起满头银发的样子，至今仍在眼前闪现。我少年时起喜爱诗歌创作，入吉林大学后就与同学一起成立了“言志诗社”。公木师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诗人”备加爱护，循循善诱。诗社的同学颇有几位成了全国的著名诗人，而我在这方面没甚发展，改道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读研究生期间，宿舍离公木师所住的东中华路的“十八家”寓所只隔一条马路，于是不时到公木师家里讨教，在哲学方面受公木师的沾溉非浅。在作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因一个理论问题去请教公木师，公木师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列宁全集》的某一卷的某一页来，找到其中的一段平素罕为人知的一段论述，来说明他的观点，我觉得非常惊讶，同时又特别钦佩公木师那种极为深厚的哲学功力。1994年我去长春看望已是髦耄之年的公木师，他又将新著《第三自然界概说》送给我，我从其中得到了更多的哲学滋养。公木师虽然已在三年前长辞人寰，但他在人格修养和学术思想给予我的润泽是我一生都受用不尽的。

我攻读博士学位是拜在复旦大学专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名教授顾易生先生门下。顾先生不惟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功底，且谙熟西文，对西方哲学美学颇为精通，易生先生对我的点拨，使我对西方的哲学美学有了更浓的兴趣。每次到先生府上请益，先生那带着很浓的上海味儿的普通话，常常闪烁着电光石火般的美妙

思想，使我感到茅塞顿开。每次听了先生的幽默而睿智的谈话，总是令我惊喜而又令我汗颜。对于先生谈到的那些以前接触很少的哲学问题或原著，回来后马上查阅。这对我的哲学素养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哲学修养对我们这些人文科学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也许并非是具体的某些范畴、某些观点对于研究工作的直接作用，而更深一层的是在于对我们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加强，给我们一副洞烛事物的法眼。同时，也使我们有着更成熟也更强劲的思想原创力。这是我在学术研究道路上感到受益匪浅的切实体验。

在我看来，中国古典美学与诗学，有着非常深刻的哲学渊源与背景，不少的美学观念与范畴，都是从哲学中转换过来的。譬如言意、境界、动静、形神等，都是从哲学中变异过来的。同时，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往往有着渊深的思想史的基因。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言诗、山水诗，都有着玄学与佛学的印痕。唐宋时期的一些重要诗人，又有着佛学的思想基础，如王维、柳宗元、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等，诗中闪烁着佛光禅影。明代的文学解放思潮，更是以王学左派的心学思想作为它的底蕴。一些重要的美学与诗学论著，如宗炳的《画山水序》、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严羽的《沧浪诗话》、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等，都有着明显的玄学、佛学作为其思想依据的。至于儒家思想，更是中国文人最主要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框架，以教化为主的文艺观念都是来源于此的。如果不了解中国哲学的基础内容与其中的主要思想体系，而对美学与文论、艺术的论著及创作只作字面意义的阐释或现象的描述，是无法真正地把握其实质与精髓的。对中国古典美学与诗学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哲学的深入理解，是很难有独到的认识与观照的。

十几年前研究《沧浪诗话》开始，我就从研究对象自身得到

了这种认识。《沧浪诗话》作为宋代最有代表性、最具体系的诗话著作，显然是以“以禅喻诗”为其方法论特征的。作者严羽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以禅喻诗，莫此亲切。”（《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沧浪诗话》借用佛学的话语体系来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如果对佛学无所了解，我们对《沧浪诗话》的认识只能是流于皮相。不懂得什么是“妙悟”，不知道什么是“正法眼”、“第一义”、“声闻辟支果”这些基本的佛学概念，就无从理解严羽所要表述的诗学思想。又如“盛唐诗人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样最能代表严羽诗学观念的话，都有着佛学的根基，不懂得这些话头的本义，也就很难确切地把握严羽的意思。于是便下决心开始对佛教哲学下工夫。后来又系统学习中国哲学史，对儒家、道家思想以及玄学、理学、心学等都较为深入地涉猎。在这样的一种知识框架中来认识一些美学的、文论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得出不同于一般成说的看法。《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禅与唐宋诗人心态》、《陶诗与魏晋玄学》等，都呈现出这种特点。

一般性的文艺学研究以构织理论框架为主，在概念、范畴的逻辑圆圈内盘桓，很少能在对具体的文学艺术的研究中提出新的命题；而一般的文学史、艺术史研究又多限于现象层面与具体对象，鲜有能升华至形而上的美学层次的。我所致力的是以哲学、美学的眼光来观照文学艺术现象，又在后者中抽绎出新的理论命题，或对原有的理论命题充实进新的内涵。在《陶诗与魏晋玄学》中，我提出了“随机的审美创造方式”的命题，在《情感体验的历程：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意象》中，我从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实践的考察中，提出了“原型意象”的几个特征：系统整合性、民族性和增殖性。在我看来，美学、文艺学不应是自我封闭的理论体系，不应仅仅在纯概念的圈子里打转，而应从文学艺术

的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生命力，从而不断地发展；而对文学艺术的研究，则应从更高的理论层面来进行认识考察，停留在现象层面来就事论事，很难洞察到深层的底蕴。从哲学的视角来观照文学艺术，并非是要把它纳入到一个固定的模式，反倒是要映照出文学艺术的生命之根。理论不应该是灰色的，而应该是一棵常青之树。理论如果仅仅是自身的循环，仅仅是概念的自我演绎，而不是以之观照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这种理论将是苍白无力的。反之，文学史或艺术史的研究者如果不是以很好的理论的、美学的修养、很高的理论眼光来进行探究，也无法使你的研究有一种高层次的建树。

重视研究主体的哲学修养，从哲学的角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这是美学与艺术学研究一种客观需要，但决不等于说可以用哲学研究代替美学的、文学艺术的研究。恩格斯曾经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506 页）这对我们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很深刻的指导意义。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不仅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且十分密切，然而，哲学渗透于文学的方式是曲折复杂的，而且，在渗透过程中往往经过了“内化”的变异。我在十几年以前的有关论著中就提出这样的看法：哲学进入文学的几种情形，一是哲学的概念、范畴直接进入文学本文，创作主体借以表达对世界、对人生的某种认识与感受，有时也在诗文中直接演绎哲学义理；二是哲学观念的渗透与濡染，使文学创作得到一种新的风格和意境；三是哲学思维使创作主体提高思辨水平，加深对事物的认识，在作品的审美情味中包蕴着深刻的理趣；四是一种哲学思潮的崛起，使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很大变化，广泛渗透于创作之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是我在十年前对于哲学与文学关系的一种认识，现

在我觉得这些想法也还是客观的。

在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与命题的研究方面，我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切入的。中国美学与文论的范畴、命题，多有渊深的哲学与思想史的背景，往往是后者在文学艺术中的变异。譬如，“文气”的范畴，显然是来源于哲学中的“气”论的。“妙悟”是来源于佛教哲学中的“悟”的。“形神”也是来源于哲学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同一个范畴，在哲学中和在美学中的涵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从哲学到美学有一个变异过程。那么，它在哲学系统中是什么样的涵义，到了美学中又是什么样的涵义？其间变化的依据又是什么？这是我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常常思考的路数与方式。在《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现量说：从佛学到美学》、《入兴贵闲——关于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要命题》等文章中，我都追根溯源，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有关范畴、命题的哲学涵义，同时，又分析了其在美学与文论中的内蕴，揭示其间的变化与差异。当然，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更显得必要和重要。

虽然是以中国古典美学、文艺学为研究对象，但是，西方哲学、美学的理论素养是不可或缺的。与中国哲学、美学与诗学相比较，西方的哲学也好，美学也好，都以逻辑的严密与思辨的力度见长。从古希腊哲学开始，这种思辨传统一直是西方哲学与美学的主流。到德国古典哲学，这种思辨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与美学，尽管在观念上是反叛与解构这种思辨传统的，在实际上在思维方式上仍然是思辨的、分析的。（个别的哲学家如尼采除外）如海德格尔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反叛形而上学传统的主帅，并将哲学与诗融为一体，但他的著述仍是充满德国思辨色彩的。其实，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念与文艺理论，我们掌握的文艺理论知识，都是源自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建国后的文艺理论体系深受俄国19世纪著名美学

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洛留波夫的影响，而“别、车、杜”同样是属于西方思想传统的。学习、吸收西方的哲学美学体系，对于我们中国理论工作者来说，我认为是相当必要的。这种必要是在于可以用西方那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方式与精确的话语系统来分析理论问题，这样可以裨补中国人固有的重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某些不足。借鉴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些范畴、概念、术语进入我们的理论话语，这对我们来说还只是表层的而非最为重要的，重要的却是使我们的思维得到更为严格的训练。若干年来，我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读西方哲学美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经典。像《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美学》等康德、黑格尔的经典之作都读了若干遍。我觉得受益最深的是在于思维能力的提高，思想创造力的培育。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学说观点都纷至沓来，我国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深受其影响，现代西方哲学美学的种种观念与方法，被中国学人所广泛借鉴并运用。在文学艺术批评中使用一些来自西方的各种流派的理念与方法，如精神分析、现象学、格式塔心理学、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等等，都显现出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新的景观。但我最为看重的却是西方学者的那种思想上的原创力。西方哲学美学流派林林总总，能够立为一家之言的，都对人类思想史有很大贡献，但同时也都有很多偏颇之处。值得我们思考的却是，西方的哲学家、美学家创造了那么多的“主义”，都有自己的范畴体系，并为我们所接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人家有很强的思想原创力。而我们却显得相形见绌。新时期以来，很多美学和文艺学的学者的主要成绩是介绍或运用西方的各种美学的、文艺学的观念与批评方法，有些人以译介为主，有些人是用这些西方的美学、文艺学的方法来重新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固然使学术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令人感到相当遗憾的是，我们为什么不

能创造出自己的“主义”？我以为，与西方的理论家相比，在思想的原创力方面，我们的学人显得萎弱与不足，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以我本人的研究而言，研究对象是偏重于中国古典的审美现象，但在很多时候有意无意地借鉴了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些观念、方法和话语，觉得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可以在另外的角度打开新的视野。我当然也没有提出自己的“主义”的学力与造诣，但在借用西方的美学、文艺学方法时，间或作一些个人的“误读”或者发挥。如在《情感体验的历程：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意象》一文中，用荣格与弗莱的原型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同时，又在原来的原型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型的三种性质，即系统整合性、民族性与增殖性的命题。我觉得，多年来对西方哲学美学的濡染，最有收获的大概在于增强了思想的创造性能力，同时，也使自己的逻辑思维得到了严格的训练。学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研究主体的主动构型能力。所谓主动构型能力，主要是对已有的材料进行不同以往的新的综合的能力。这大概也与康德所说的“先验综合判断”颇为相似。推动学术发展，一方面离不开对已有的材料进行发掘整理，另一方面，则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力，进行新的综合，构建出新的图式。我以为一部思想史也好，一部美学史也好，从这个角度来看，大略是不同的思想图式的不断更新转换的过程。

学术事业既要有深远的历史积淀，更要有朝日般的新的思想时时升起。

在哲学、美学与诗学之间，我走着自己的路。

2001年7月25日